

“文化整合”语境下的西域文化

王智娟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中华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当然，文化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多元，更不是分裂的理由。古称“西域”的新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有特色的文化区。从表面上看，西域一向通行“胡语”，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并在那里生根后，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似乎拉开，但实际上，汉化与胡化一直在祖国的这片热土上生动地进行着，特别是清王朝统一新疆后，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应看到，经过两千年的政治文化整合，确立了西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应继承中华文化整合的优良传统，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达到“三个高度认同”，即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认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参照系的文化整合，应是祖国统一和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西域文化，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考古发现，在远古时代的今天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不同的人群，如元谋人（云南）、兰田人（陕西）、北京人、丁村人（山西）、马坝人（广东）等，后来发展形成不同的部族、族类。大约距今五千年至三千年间，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人，在与周围的不同族类长期交往中，不断地吸收、融合周围的不同族类的人群中发展壮大，已不再是单一血统的民族，如古籍所说的“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民族融合的不断进行的结果是，至汉代以后，形成了愈来愈庞大的汉民族，而其周围的部族、族类也在不断地相互吸收、融合，甚至重新组合。形成今天的中国诸少数民族。

中华区域文化的格局可能形成于中原氏族宗法体制瓦解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史学者大致将当时的区域文化分析归纳为齐鲁、楚、吴越、巴蜀、秦、三晋等文化区。当然在讨论中原华夏文化与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文化的交融时，也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文化过程，但严格地说，这种分析归纳的视角基本上是汉文化，甚至下意识地将中华文化与汉文化划等号。然而事实上，中华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站在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立足点看，应承认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当然，文化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多元，更不是分裂的理由。尽管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但自秦汉以来就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事实上，从遥远的石器时代开始，华北地区的人群就不停地向西部青藏高原、新疆地区迁徙，而西部高原上的人群同时又不不停地穿越横断山脉和河西走廊迁移中原地带。在大海与西藏、新疆之间的这片广阔的地域，外来因素渗入较少，在这片热土地上，来回这么活动的都只是这么一群人，不应当忘记这一历史过程长达五千年。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国文明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诸民族，它们经济联系密切，政治文化相互认同，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上的民族构成，但既不否认各自的特性，也不排斥各民族间的差异性，这正是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古称“西域”的新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有特色的文化区。秦始皇统一文字，汉武帝独尊儒术，标志着汉字、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佛教、摩尼教、景教入中原，有过不

同的影响，但终究也或多或少地儒化。从表面上看，西域的居民体形多与内地中原人有较大差别，一向通行“胡语”，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并在那里生根后，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似乎拉开，但实际上，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的西域文化与内地中原文化的交融从来没有停止。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从来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多民族聚居杂处、共同发展的地区。早在远古时期，这里生活着肤色、语言、生活方式都有较大差异的不同人群。他们在史籍中被分别称为“塞”、“乌孙”、“月氏”、“羌”、“匈奴”和“汉”等。塞人在西方史籍中作 Saka，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地带。古代新疆的塞人和乌孙人、月氏人早先活动在河西走廊，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相继迁来。羌人起源极为古老，传说中的炎帝就是羌人的祖先，后来其中的一部分向东迁，较早地融入华夏族，另一部分向西迁，至甘肃、青海一带，而后进入昆仑山麓。匈奴人是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很早也进入天山一带。新疆的汉人主要是戍边官吏、屯田士卒、商人、遗犯及其家属，至汉代末年，汉人已经形成分布新疆各地有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人种学、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疆的古代居民体质形态既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又有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更多的体质形态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合和变异的特点。欧罗巴人种分布由西向东运动，而蒙古利亚人种则由东向西移动，新疆地区成为这两大人种交汇的地带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后新疆民族演变发展的历史，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来自北方草原的骑马游牧人不断南下，高车、柔然、突厥、回纥、黠戛斯、蒙古等部落的进入，一浪又一浪，与当地土著相融，不断地改变着新疆的民族色彩。正是这些不同的人群共同生活和努力，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域文化。

中华民族的进程中，汉化是主流方向，但那主要在中原及其周边广大地区，而距中原较远的新疆可能更多地是胡化。历朝历代汉人不断入疆，但大多都溶入新疆的民族熔炉之中。如公元 499~640 年间，今吐鲁番地区有个麴氏高昌国，那里汉人云集，读的是汉文书籍，说的却是胡语，即少数民族语言。后来，这个麴氏高昌国被回鹘高昌国所取代，那里的汉人消失了，哪里去了？回鹘化了，溶入了维吾尔族之中。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贵族成为新疆的统治者。元帝国亡于明王朝后，新疆仍处于蒙古察合台后王统治之下，但几百年过去后，处于统治者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也都维吾尔化了。汉化或胡化，固然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直接后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此同时的是多民族间凝聚意识的不断强化，历史文化认同的不断扩大和深化。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又突出地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的文化传统，这是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经历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国家特点所决定的。《尚书·尧典》强调“协合万邦”，《礼记·礼运》把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定于一”。汉语中的“国家”为国一家，即视“国”为放大的“家”，为民共有的大家庭。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无论出自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持有“大一统”的国家观。秦始皇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唐太宗说：“混六合以为家”。北魏太武帝志在“廓定四平，混一戎华”。忽必烈改称“大元”时说：“见天下一家之义”。清乾隆帝赋诗将万里长城寓意为“大一统”国家内的“苑囿”。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决定其兼容并蓄的海量，在中国大地上的多元文化都为之咀嚼、吸收、丰富、发展，融为一体，成为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深层次地激励着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宋代，在新疆曾有个少数民族政权哈拉汗王朝，首先接受伊斯兰教，但它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个王朝，它的许多汗王自称“桃花石汗”，即“中国之王”。与之同时的尉迟氏在今新疆和田称于阗王，他仰慕华夏文化，模仿汉服饰，行政建置仿唐制，并改尉迟氏为李氏，号“李圣天”，史称“于阗李氏王朝”。汉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和西北的地方政权在西域都有各种行政建置，这里的地方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即便在中央王朝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也是如此。例如，明清之际，阿布都喇依木、阿卜勒马黑麻父子，为当时新疆的叶尔羌汗国东部地区的统治者“苏鲁檀”（苏丹），前者在明朝灭亡前最后一次通贡，后者在清朝建立后首先通贡。再如，明清之

际，原居新疆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远徙伏尔加河流域，但一直心系中华。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首领乌巴锡等计议：“俄罗斯持教衣冠俱不同，愿依中国兴黄教之地，以安部众”。于是有历经艰辛的万里回归祖国的壮举。

清王朝统一新疆后，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原为“蛮夷”的满清入关后，清朝皇帝很快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取得在中国这片辽阔土地上统治的合法地位，归根到底是他们完全接受了中华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捍卫文明的儒家教义为己任。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乾隆帝御制谕昭曰：“斯声教益溥于要荒，将惠恺覃于海寓”；要求：凡五嶽四渎、历代王陵、先师孔子阙里等，“应遣官致祭，著照例举行”。这既是对儒家教义确认的宣言，也是以儒家思想实施新疆统治的要求。乌鲁木齐改称迪化，正是取儒学中的“启迪教化”之意。官方的儒家政治思想意识如此深入到新疆，是开了历史之先河。残存的几十种清末新疆乡土志记载，在新疆各县，甚至于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各县，都修建有文庙、孔祠、昭忠祠等。这是清以前所未有之现象。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全疆各地还普遍建有关帝庙。所祭祀的关羽是神化了的三国时代的英雄。在一千年里，通过小说、戏剧以及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传说，关羽的故事家喻户晓。自宋代以来，关羽被帝王不断加封进爵以至尊之为武神，“三界伏魔大帝威远镇天奠关圣帝君”。清代，关帝的祀典提高到与孔圣之并列之地位。此时的关帝是忠义的楷模，更是熟读经典、深明大义的大儒。建于1763年伊犁惠远城关帝庙，其正门就悬挂“神佑新疆”匾。1828年，受命平定新疆战乱的一位将军报告：与敌在阿克苏作战时，至少有两次危急时，陡起大风，尘沙飞扬、红光烛天，关帝显灵，是以官兵大获全胜。此虽是是无稽之谈，但道光帝被哄得喜出望外，下令礼部再给关帝加“威显”封号。此后，新疆兴修关帝庙的热情更加高涨。清嘉庆年间遣戍新疆的名士洪亮吉所著《天山客话》中记有：“塞外虽三两家，村必有庙，庙皆祀关神武，香火之盛，盖接西海云”。前些年，一次“辛亥革命在新疆”的学术会议上，一位伊犁维吾尔老先生报告说，当年参加伊犁革命的志士中就有号称“玉素甫关公”、“买买提关公”之传说。所有这些生动地说明，儒家精神为内涵的古代中华文化在新疆的深远影响。

约自10世纪起，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但直到14世纪东察合台汗国的可汗的统治时，它才在维吾尔聚居的南疆地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17世纪，信仰藏传佛教的准噶尔蒙古部在南疆通过其保护下的伊斯兰和卓集团的神权政权实行统治，也就是说，在清朝统一新疆以前的南疆穆斯林就处于“异教”的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后来的清朝统治，对于维吾尔上层来说，同样地接受“异教”统治，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维吾尔上层在顺从“异教”统治的同时以伊斯兰的“沙里亚特”法维持着社会的稳定，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与清朝“因俗而制”的基本政策是协调的，而且在理论上是有自圆其说的根据，那就是中亚传统的“盐的义务”。1864年，库车发生暴动时，一位维吾尔的君王声称：“我祖祖辈辈都是效力于大汗（指清帝）…不管他信不信伊斯兰教，我是从祖辈那里承袭下来并要继续沐浴他的荣华。吃着他的盐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应该背叛赐给我们盐的主人。恪守‘盐的义务’，是所有作为人的应尽的责任”。1857年，伊斯兰和卓集团勾结外敌反叛，叶尔羌的大阿訇发布“法瓦特”（宗教法令）：“无论强盗从哪里来都要把他们消灭”，动员穆斯林民众抗敌平叛，体现了民族宗教精英的现实主义。现实是什么，是新疆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尽管新疆作为伊斯兰（dar al-islam）与非伊斯兰（dar al-harb）的接壤地带，尽管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动乱，新疆却没有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归根到底是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西域文化的底蕴所决定的。

自西汉起，汉之军人、商人往来于中原与西域，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化不言而喻地也随同他们进入。新疆各地的考古不断发现在木简、绢上的记录之书籍，如历法、占卜、药方、兵学、算学、小学等。早在汉代新疆使用的汉佉二体马钱，表明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在遥远的古代就并行而用。魏晋南北朝以后，纸质书籍，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大大增加，出土的经史、诗文到佛、道之典籍，遍及新疆各地。日本学者羽田亨的结论是：“在这

种情况下，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古以来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实”。汉语与目前新疆通行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确有较大的差别，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在新疆的基层，汉族与少数民族往往说的是一种混合语言，汉语中有维吾尔语，维吾尔语中有汉语，不仅是词汇相互借用，甚至句法结构都在相互影响。新疆的汉人从维吾尔说“皮牙子”，而几乎忘掉了“洋葱”的说法。有的混合词汇，如新疆俗称妇女为“阳侏子”，维汉一般都以为是对方的语言，但实际上是维吾尔语的“yangai”（嫂）加上汉语的“子”的混合语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筷子之使用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今天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已普遍使用筷子，在放弃手抓、木勺而熟练用筷的过程（境外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现正使用西方的刀叉），从来没有任何政府和长官的意志，我们这些同胞何时用起筷子，史无记载，但中华文化就是这样地深入新疆各少数民族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三

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总有着深层的文化背景。比如，新疆和与其毗邻的中亚地区许多民族操突厥语并广泛信仰伊斯兰教，究其历史，即在近一千年曾有过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文化现象：（用学术语言来说）语言“突厥化”和宗教意识的“伊斯兰化”的过程——这就是“双泛”流行所依托的地缘文化背景。事实上，“双泛”可以跨民族、跨国家横行，但它只能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操突厥语族诸民族中谋取空间；它可以从土耳其到新疆这一广大地区蛊惑人心，但过不了星星峡，也越不过昆仑山。

但是，多元文化的交融、相互渗透和共享，是世界、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的历代治理边疆民族政策一般都带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深厚的烙印，但其中也有值得借鉴的东西。比如说，它比较重视文化整合工作。中国传统强调的是文化为本，而非“体质”，甚至不大重视语言差异，以为“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古代中国有“华夷之辨”，但“其不在地之内，而系于礼，即以儒家思想伦理为参照系，把“天下”的所有人群划分为“（教）化内”和“化外”两类，强调有教无类，通过“教化”使“生番”为“熟番”，如前所述，乌鲁木齐曾名“迪化”，就是取“启迪教化”之意。

西方的传统理念是重体质，白人非白人分得一清二楚；重语言，语言的差异就是“你们”和“我们”的对立；重宗教，不同的宗教背景的人们可以相互视为异教徒而杀个你死我活。在这种政治理念驱使下的民族主义表现得特别极端。

西方的传统政治理念，概括起来是，语言、文化，有时甚至包括宗教，被认为构成了同一个原始实体即民族的不同侧面，其核心是种族，将人类划分为相互独立和相互区分的民族，并宣称这些民族必须构成主权国家。正是依照这种理念，西方习惯地将民族宗教关系高度政治化处理。其政治整合的要点仅仅是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转变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为了国家的纯粹，不惜将“野蛮”的异族赶尽杀绝；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则为了国家的纯洁，鼓励按民族、种族、宗教界线搞民族分离、国家的分裂。二者相通之点是，不“认同”、认异而不宽容。实际上，强调民族的绝对权力、宗教的绝对自由、民族自决，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一味地将民族宗教关系政治化，问题只能越搞越多、越搞越乱。

现今，一些西方国家特别热衷于以人权、民族自决权、“宗教自由”来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甚至于借此肢解它国，但同时在处理本国民族宗教问题时，力图把它文化化。如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倡导向主流文化靠拢的“多元文化主义”愈来愈时兴。它们都是移民国家，种族、文化来自全球各地，移民社会的建立很长时间内依照着“盎格鲁遵从”（Anglo-Conformity）模式的同化方略，20世纪开始向多元文化整合方向转变。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所认为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在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力图把民族问题‘文化化’，而我们却遵循着西方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把民族问题政治化，这里的错位现象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我非常赞成马戎教授的意见：“我们应当维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而不要把欧洲的“民族国家”、“民

族自决”这样的政治传统简单地拿过来，把我国的一般的民族问题‘政治化’。”

应看到，经过两千年的政治文化整合，确立了西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这正是“东突”势力搞民族分裂所面临的障碍，民族分裂分子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所作所为集中到一点，就是千方百计地否认维吾尔族在中华民族“一体”中的地位，其典型口号是“三个我们的”（我们的文化是伊斯兰，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我们则应继承中华文化整合的优良传统，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达到“三个高度认同”，即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中国。如果说，古代作为当时的先进文化的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整合的参照系，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先进文化应是今天我们进行文化整合的参照系。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整合之深入，应是祖国统一和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如此“文化整合”语境下西域文化，其发展趋向是顺历史前进方向的，因此也是进步的。

（本人写作过程中多方面参考了潘志平先生未刊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主要参考文献

- [1]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2]郝时远. 当代世界民族与民族政策[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 [3]戴逸. 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N]. 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 [4]庞卓恒. 世界古代帝国和文化兴衰[N]. 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M].
- [5]张传玺. 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N]. 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M].
- [6]马戎. 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N]. 新华文摘, 2000-12.
- [7]郝时远. 寄语新世纪[N]. 世界民族, 2001-1.
- [8]费孝通.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N]. 群言, 2003-4.
- [9]黄朴民. 论中华文化与国家统一[N]. 新华文摘, 2003-8.
- [10]羽田亨. 西域文化史[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1.
- [11]潘志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的“文化整合” [N]. 新疆社会科学, 2003-5.

West region culture under the culture integration background

WANG Zhi-juan

(History Department, Xinji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Abstract : The resources of chinese culture are pluralistic. But the pluralistic concept of culture doesn't mean the pluralistic concept of politics. Also it is not the right reason for separatism. Xinjiang which was called in history as west region is a very distinctive culture region in chinese culture. Superficial, minority language is very popular in west reg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Islam spreading and settling in this region, the distance between centralism and minoritism seemed to be enlarged. In fact, Chinese centralism and minoritism is always existed actively in China., especially after the unitary of xinjiang in Qing dynast, the blend of west region culture and central culture developed into an unprecedented period. We should see that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2000 years, the west region culture has established its place in chinese culture. We should inherited the good tradi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o that our cadres and the masses of all nationalities in xinjiang will reach the “three high approval” ideologically, sentiment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That is our culture is chinese culture, our nationality is chinese nationality, our homeland is china. I think that consulted the important ideas of “three represents”, the culture integration should be the vital assurance for the unit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long term

security of xinjiang .

Key words: West region culture culture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 2003-10-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 2001 年度特别委托项目“周边的民族宗教冲突与新疆稳定”
(批准号: 01@ZH020)

作者简介: (1956-), 女, 汉族,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